

第5辑

XIANDAI ZHONGGUO
WENHUA YU WENXUE

现代中国 文化与文学

四川大学文化遗产与文化互动研究基地
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研究中心

主办



四川出版集团 巴蜀书社

四川大学文化遗产与文化互动研究基地
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研究中心

主办

现代中国 文化与文学

第5辑

XIANDAI ZHONGGUO
WENHUA YU WENXUE

四川出版集团 巴蜀书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 第 5 辑/毛迅, 李怡主编. —成都: 巴蜀书社, 2008. 5

ISBN 978—7—80752—145—7

I. 现... II. ①毛... ②李... III. ①文化—研究—中国—现代—丛刊②现代文学—文学研究—中国—丛刊 IV. ①G122—55②I206. 6—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46217 号

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五) 毛迅 李怡 主编

责任编辑	李 蓓
出 版	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 成都市槐树街 2 号 邮编 610031 总编室电话:(028)86259397
网 址	www.bsbook.com
发 行	巴蜀书社 发行科电话:(028)86259422 86259423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成都蜀通印务有限责任公司(028)84122206
照 排	成都完美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	2008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成品尺寸	230mm×170mm
印 张	18
字 数	440 千
书 号	ISBN 978—7—80752—145—7
定 价	38.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工厂调换

编 委 会 名 单

编委会主任

曹顺庆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编 委

(以汉语拼音为序)

柏桦 蔡震 陈国恩 程光炜 陈方竞 丁帆
范智红 高远东 高旭东 邹元宝 何锡章 金龙云(韩)
孔范今 孔庆东 李今 李继凯 刘福春 刘勇
宋梅健 罗振亚 逢增玉 朴宰雨(韩) 谭桂林
王兆胜 王中忱 魏建 解志熙 岩佐昌暉(日)
袁国兴 杨剑龙 张中良 赵学勇 郑家建 朱栋霖
朱晓进 朱寿桐 邹红 张健 张福贵 周晓明

刊前絮语

本期“卷首”推出了两篇具有特殊意义的文章，一篇是关于中国现代文学著名学者许志英先生的纪念之作，许志英先生的学问与人格素来为学界所景仰，他的逝世不特是当代学术的损失，可能也是亟待建设的我们的精神世界的损失，作者万同林先生曾勉力打捞现代文学史上的那些被压抑的精神“殉道者”，今天，他饱含深情的文字能够让我们感触良多。在中国现代文学发生发展以及后来的学术研究中，四川大学知识分子群体做出了十分重要的贡献，而这样的实绩还从来没有人系统梳理过，以至于今天的人们多半都知道作为传统“蜀学”重镇的川大，却很少提及甚至想起作为现代文化与文学重要根据地的川大。在我们看来，当代中国一切学术的建设、一切文化的发展都莫不根植于现代人的生存状况与生命意识，即便继承传统的学术也在事实上离不开现代的人生经验，因此，发掘、梳理和弘扬这些弥足珍贵的现代新传统，恰恰应该成为我们更加自觉的追求，这里的梳理仅仅是开始。

“文学史新论”刊发了10篇论文，它们构成了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多维度的理解和认识，可以说均充满新意。许祖华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知识体系的检讨启示我们从整体上反思我们今天学术的姿态和取向。任冬梅关于近代科幻小说、余夏云关于鸳鸯蝴蝶派文学的论述揭示出了传统的现代文学史研究所忽略的对象。龙敏君从《伤逝》中读出“民族主义”，曾利君剖析几位当代作家的“民俗描写”，陈晖从文学中发现青少年“成长”的记录，都给人耳目一新之感。廖久明、李光荣、卢亚兵的研究则展开了历史发展中几乎被人遗忘的部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理所当然地也应该包括对少数民族文学现代形态的研究，希望梁昭博士的论文能够传达我们的这一学术理念与编辑理念。

“国际汉学”与“巴蜀文学重读”是我们努力建设的栏目，并且它们的相互参照也别有意味地传达出了一个重要的信息：本土与外来原本就可以形成这样的并存与对话，本土与外来的对立在很大程度上不过是一种特殊心态的产物。在越南学者阮秋贤先生的论述中，我们不难体会到一位亚洲学人在人生学术理念方面与我们的一系列相似。本刊特别欢迎国外学者对“巴蜀文学重读”的解读。

“现代文化研究”中的几篇文章都值得一读，孟庆澍对“近代舆论兴起”的考察，谭佳对现代学术发展的审视，都为我们展示了现代文化研究具有生长性的可能。

“中国文学档案”是本刊的特色栏目，我们希望通过持续不断的努力来保存和整

理更多的现代文学的原始资料，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深入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除了刘福春先生的系列连载外，这里又增加了陈思广先生、朱佑红女士的重要学术成果，希望对现代文学的研究有所助益。

愿我们的刊物能够继续得到学界同仁及广大读者的支持！

目 录

刊前絮语 (1)

卷首语

我与许志英先生 万同林 (1)
四川大学与中国现代文学 程 骥 (5)

国际汉学

中越反封建家庭小说比较 (越南) 阮秋贤 (23)

巴蜀文学重读

从女性创世神话走出的《女神》

——《女神》与日本文化之一 蔡 震 (31)

郭沫若从边缘走向中心的精神气候与心理动因

——“五四”前后郭沫若与同乡同学关系略考 陈 例 (42)

郭沫若与《洪水》 咸立强 (51)

郭沫若《屈原》：性与政治的偷情 沈庆利 (60)

早期巴金的安那其信仰与文学 白 浩 (63)

沙汀小说中的川西北乡镇 范 琦 (74)

文学史新论

用什么话语系统编撰中国现代文学史？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知识学问题思考 许祖华 (81)

科幻乌托邦：现实的与想象的

——《月球殖民地小说》和现代时空观的转变 任冬梅 (92)

从《伤逝》谈鲁迅的民族主义思想 龙敏君 (111)

莽原社与“五四”后思想革命的兴起及夭折 廖久明 (117)

冬青社的小说创作 李光荣 (128)

鸳鸯蝴蝶派与新文学的斗争形态考察 余夏云 (138)

从启蒙到救亡：艺术视景的转化、深入与局限

——王余杞小说创作简论	卢亚兵	(154)
试论新时期小说的民俗描写		
——以贾平凹、陈忠实、韩少功的小说为例	曾利君	(167)
青春生命的殷殷守望与人类文明的终极关怀		
——王安忆作品《遍地枭雄》作为成长小说的解读	陈晖	(175)
苗族蚩尤叙事中的族性书写	梁昭	(184)
现代文化研究		
报刊、学堂与租界		
——近代舆论兴起的物质性条件	孟庆澍	(194)
现代化转型中的“《春秋》学”悖论		
——以梁启超的观点为例	谭佳	(206)
从西方到本土		
——宗白华美学思想转换背景浅析	徐欢	(216)
中国文学档案		
中国新诗档案：1953	刘福春	(223)
中国新诗档案：1954	刘福春	(233)
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编年（一）	陈思广	(248)
沈起予1928年至1951年著译年表	朱佑红	(272)
稿约与稿例	本刊编辑部	(280)

Contents

Words Before the Compiling (1)

Preface

Mr. Xu Zhiying and I Wan Tonglin (1)
Sichuan University and Chinese Modern Literature Cheng Ji (5)

International Sinology

The Comparative Research on the Sino—Vietnam Anti—feudal Family Novels
..... (Vietnam) Ruan Qiuxian (23)

Rereading of Bashu Literature

Goddess Stepping out of the Female Creation Mythology

—Goddess and Japanese Culture I Cai Zhen (31)

Guo Moruo's Spiritual and Psychological Motives from the Brink to the Center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uo Moruo and His Folk Classmates Before and
After the May 4th Chen Li (42)

Guo Moruo and *Flood* Xian Liqiang (51)

Guo Moruo's *Quyuan*: Sex and Political Clandestine Love Affairs

..... Shen Qingli (60)

Ba Jin's Belief and Literature in his Early Time Bai Hao (63)

The Sichuan North—west Towns in Sha Ting's Novels Fan Qi (74)

New Angles on Literary History

What Discourse System Should be Taken While Compiling Chinese Modern Literary
History

—Reflections on the Problem of knowledge in the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Research Xu Zuhua (81)

Utopian Ideas in Science Fiction: Realism and Imagination

—*Moon Colony Novel* and Modern Changes in Space and Time
..... Ren Dongmei (92)

Lu Xun's Thoughts of Nationalism in <i>Sentiments Against the Passed</i> (<i>Shangshi</i>)	Long Minjun (111)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Mangyuan Society and the Rise and Fall of Thoughts Revolution After the May 4 th in 1919	Liao Jiuming (117)
The Novel Creation of the Dongqing Society	Li Guangrong (128)
The research on the Dispute Between the School of Mandarin Duck & Butterfly and the New Literature	Yu Xiayun (138)
From Enlightenment to Salvation: the Transition, Deepening and Limits of the Art's Vision ——On Wang Yuqi's Novels	Lu Yabing (154)
The Folk Description of the Novels in the New Era ——By Jia Pingwa, Chen Zhongshi, Han Shaogong's novel as an example	Zeng Lijun (167)
The Keen Watch on the Young Life and the Ultimate Care for Human Culture ——The Interpretation of Wang Anyi's Work, Controversial Heros Everywhere as a Growth Novel	Chen Hui (175)
The Ethnic Writing in the Miao's Chiyou Narration	Liang Zhao (184)
<u>Modern Cultural Studies</u>	
Newspaper, School and Concession ——The Material Cause to the Rise of Modern Public Opinion	Meng Qingshu (194)
The Paradox of <i>Spring & Autumn</i> School in Modern Transformation ——By Liang Qichao's Point of View	Tan Jia (206)
From the West to the Native ——On the Background of the Changes in Zong Baihua's aesthetics	Xu Huan (216)
<u>Chinese Literature Files</u>	
The Record of Actual Events about Chinese New Poetry: 1953 ... Liu Fuchun (223)	
The Record of Actual Events about Chinese New Poetry: 1954	Liu Fuchun (233)
The Chronicle of Chinese Modern Novels (I)	Chen Siguang (248)
Shen Qiuyu's Chronology of translation: 1928—1951	Zhu Youhong (272)
Notice to Contributors	the Editorial Department (280)

我与许志英先生

□ 万同林

“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请自己去。”这句古老的谶言，实在毫无道理，却偏偏残酷地时有应验。我所尊敬的指导老师许志英先生，就在2007年9月13日刚刚穿透子夜时分，进入14日0点16分，于他七十三岁的命运之坎上，自己选择了远行天国并乘鹤西去。

他走得从容，淡定。走之前的几天，忍受中风病痛和思亲之苦（许夫人于半年前的春天去世）折磨的他，专门为自己淡然宽怀地料理着尘缘世事。他给自己最得意的几个门生，包括张生等，一一打了较长的电话，问长问短，并有说有笑。自缢前一天晚上，他和自己的一位老友聊天，问孔子是不是活了73岁，告之曰是，又问73是实岁还是虚岁，再告之曰虚岁，许先生便说：“我还多活了一岁。”第二天，即行西途。他所留下的一腔遗言是：“生与死，一念之差。而今，我生意已尽。”所以，是他主动预约了另一个世界的行程，在今世完成了自我之后，堪称走得“完美”。

瞬间完成了彻底的遁世，让认识或熟悉许先生的人觉得，他并没有走。时间拉回二十多年前，他的音容，他的影子，再次浮现眼前。中等偏下的个头，戴一副厚如玻璃瓶底的眼镜，着装朴素、朴实到了平民化的极致，让人看不出他是一位名牌大学的教书先生。站在讲台上，讲授《中国现代文学思潮史》的许先生，面无表情，不苟言笑，说话慢条斯理，声音低徊，节奏平缓。他在第一节课，对于台下毕恭毕敬的听课学生，开宗明义地宣称：“我的教学，就是填鸭式，我喂你食，完全是灌输式。”非常明确，大家选了他的课，就要准备好接受他的“非现代”的讲授方式。就这样，一堂课接一堂课下来，鸦雀无声；没有交头接耳，也没有提问；除了他自己讲课的声音，伴着粉笔板书的零星吱喳，以及同学们做笔记时的沙沙响动。他所重点讲授的是“五四”文学思潮，是他那些年潜心研究的成果。我们离开校园后，他陆续出版了发韧于那个时期的几本学术专著《“五四”文学精神》、《“五四”：人的文学》、《中国现代文学主潮》等。

转眼到了要做学年论文的时候，选择指导老师时，我义无反顾地填了许志英先生的名字。初始，我自报的题目是现代文学史上一个有特点的小人物丘东平。这位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小作家，没有特别的地位，我是很清楚的。但止不住个人喜欢，他的小说和报告文学曾给过我震惊和感动，他的文笔一如西式油画般的凝重，对于战争和战斗生活的凄美与苍凉，描写得淋漓尽致，还时不时展露出“意识流”的片断。而作家本人生命的终结也是一个“悬案”，在新四军的一场战

役中遗留下突然失踪之谜（自杀或牺牲），曾紧抓住我，让我迷醉一时。因此，我很认真地向许先生交出一个较为详细的论文提纲。许先生看了良久，以一种不容辩解的沉稳口气对我说：“不行。”我沉默不语。他接着说：“丘东平不是不可写，也不是不值得写。但，你是不是还有更好的选题？”他不给题目，我只好自己另行定夺。长思了一两周后，我找他报告，说自己想换成早期创造社。他说：“好的。你自己读书查资料去吧。”除此之外，没有具体意见。于是，我搜遍了学校图书馆和系资料室，借阅了几乎能够找得到的有关早期创造社的各种原始的与后人复制的报刊及图书资料。最后，完成一篇万余字的《西方现代文学观念的初始引进——关于早期创造社的文学本体论》。没给他看过提纲，直接把论文交给了他。成绩是，他给打了个优字。这篇论文后来发表在一家学报上，被中国人民大学报刊资料中心《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转载。

其实，大三的时候，课业之外，我个人的大部分兴趣与时间都花在了研究胡风上。那时，胡风刚获得过第一次平反，结论中尚留有需要第二、第三次删除的“尾巴”，在教科书上，于“左翼”内部，基本上是个负面人物，在学术上还是“禁区”。不知道哪来的胆识，我写了一篇全面为他平反的近两万字论文：《侦破中国新文学史现存最大公案——胡风系列研究序》。作协“四大”开过之后，创作自由被重新肯定，学术相对宽松。这篇论文找胡若定系主任签字打印出来后，也寄给正在医院处于弥留之际的胡风先生一份，由他女儿张晓风代读，胡风先生提了两条意见。稍后，我投寄当时位居思想前沿的新锐刊物《青年论坛》，竟在1985年第五、六两期连载公开发表了。算是代表民间立场，中国人大报刊资料中心《文艺理论》等处转载。李泽厚还在《人民日报》上的一篇文章中作了评点。也就是凭着这么一点儿成绩，我后来受邀参加胡风逝世半年后才召开的追悼会，找胡若定系主任签字报销了差旅费。这在本科生中是破天荒的。日本留学生冰上正赠送了我两卷富士胶卷，用我女朋友的相机，拍回一些资料照片，部分转交给了系里。

接下来，要做毕业论文了。由于那个“序”的发表，我一口气又写了两篇胡风研究专论。一篇交由叶子铭先生，充当他的《文艺学新方法论》课程的结业汇报；一篇交由许志英先生，充当我的毕业论文。叶先生很宽和友善，给了个优的分数。许先生，从严以对，只给了个良。有同学回忆说我“论文写得好”，其实大学毕业成绩远比大家为差；估计，没有几个得良的，多数是获了优。

然而，我并不看重这个。对于许先生，除了感激，更没有一丝一毫的怨言。因为，我知道他的标准。除了就学术论学术，许先生不夹杂任何其他的动机。至于具体该评个什么分，实在是不重要，或者说微不足道。我也知道，他充分相信一个不够风光的成绩单，对我不会构成压力或“打击”。上升到纯粹学理上的探讨，师徒之间就更不必在乎分数。那篇毕业论文《论当代文学观念走向封闭的根本转变——胡风系列研究之二》，我曾求助于任天石副系主任签字打印出来，寄给鲁迅博物馆馆长李何林先生。当时，李老在北师大兼职带博士生，王富仁先生就是他已出师的高足。蒙李老爱掖后生，很快给我寄来一份铜版纸彩印的北师大

博士生招收简章，要我投考他的博士。很遗憾的是，本科直接升博要加考政治等项，我的外语也成问题，只能望博兴叹一回。来京不久，我即去位于史家胡同的李府，专门拜望了李老一次。身材高挺清瘦、鹤发童颜的李老，谦和得让我十分感动。李先生辞世后，我还去八宝山参加了他的追悼会，这也是我去那个地方为数很少的几次之一。

坦白地说，我和许志英先生交往、交流得并不多。师徒之间称不上相知很深，但彼此之间确实是有所理解的。就我浅显的感知，许先生后半生学术最大的闪光点之一，是对“五四”文学“本义”的捍卫及探索，他所做的属于正本清源的工作。就文学论文学，回归“五四”文学本体，几乎成为几代学人的所求。其实，这在当初不过是一个基本的事实。胡适《文学改良刍议》提倡“白话文”，算是点题；陈独秀发表《文学革命论》，提倡平民文学、写实文学、社会文学，则再行破题；到周作人举旗《人的文学》，方称得上画龙点睛的入题，作为那个时代的“文眼”，则是“以人道主义为本”。胡风在《文学上的五四》中，概括为“以市民为盟主的五四新文学，是世界进步文学在东方新拓的一个支流”。这，曾被许志英先生引以为道。诸如“五四”文学的代表作，鲁迅的小说《狂人日记》与郭沫若的诗《女神》，其实都是呼唤“人的觉醒”。就这么一个简单事实的回溯，历经文化浩劫与学术思想禁锢，也要付出并耗尽一两代人的精气神呵。我因研究胡风，与许先生有了声应气求。

师对于徒，同样是有所了解和理解的。时间依然向上追溯到二十多年前，我毕业来京后旋即调进《文艺理论与批评》编辑部工作。恰巧，那之后赶上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组织召开的规模不算小的“新时期十年文学讨论会”。当年，作为所长和主持《文学评论》的刘再复，与我所在的刊物主编陈涌之间，关于文学主体性的论争正进行得如火如荼，两大阵营壁垒分明。我被派去参加那个会。在与会的花名册上还是什么地方，得知许志英先生也回他的“娘家”参加那个会了，并且与《文学评论》时任副主编的王信先生同住一个房间。我当然不能错过拜望老师的机会。师徒相见，好像也没怎么嘘寒问暖。倒是许先生率先提出：“我给你的毕业论文只打个良，你没什么意见吧？”我立即接话：“怎么会呢？”随之，他转向王先生说：“他们那一届，大多数导师给自己学生成绩打的都是优，我只给了他一个良，很少老师这么做的。”引来王先生共同谈话的兴趣，知道了我的“来意”后，首先告诫我：“不要向你的老师约稿。”接下来又意有所指地说：“年轻人，要多学习，弄清学术方向，别被同化了。”我正有些尴尬而沉默着，许先生为自己的弟子说话了：“他约，我也不会给他写。至于是否会被同化，这个我并不担心。”然后，他冲向王继续解释说：“听他同学反应，他有点怪，个性上独立特行。”天哪，这师傅对于徒弟真是了如指掌。的确，后来我在那个编辑部工作了五年，一直被上层主管认为“不合槽”。

汪应果先生曾说：“许志英老师，是我们系的思想家。”对于这话，起初理解不深，而且主要是限于学术认识的范围之内。据我所知，许先生在社科院文学所工作时，被誉为年轻的才子之一。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他因为研究

“五四”文学，在对于这段文学性质的认定上，触过雷区。胡乔木就曾对这明确地表示过异议，许先生因是获咎遭“贬”。未向他本人求教过，不知何故，许先生离京至宁“戍边”南大。个人认为，调到南大工作，应该算许先生的转机和幸事。南大是沃土，他则是学术之花；中文系与他共同成长，成就了他晚晴的灿烂。复出后的匡亚明老校长，极其尊师重教，还专门为中文系延请来尚未平反摘帽的右派陈白尘、程千帆、张月超等学界卓富名望的老先生，树立并开拓了良好的校风学范。传到叶子铭、许志英、董健这些先生的一代，他们继续着，发扬着。读了许先生的《和老叶相处的日子》，更加深了这种印象。

许先生走了。他，走得明朗却又神秘。一遍又一遍地焚心敬读他怀念叶子铭先生的文章，也许从中能够感悟出他自己选择终结人生的真谛。或许，他意识到了自己非走不可，他一定要走得干净，漂亮，甚至庄严。于是，他用了自己的方式，彻底地完成了自我。我要说，他走得完美。生不由他，死却为他自己作主；他平静、安祥、坦然、自若、无惧无畏地，完成了最后的行为艺术。

印象中，许志英先生只对我笑过一次。那是二十多年前，在北京西路2号新村他的故居。相信，此时此刻，许先生正在天国笑意盎然。

（作者为中国青年出版社编辑）

四川大学与中国现代文学

□ 程 骥

作为一所拥有 110 年历史的现代名校，四川大学与中国现代文学^①的历史在两个不同的层面上互相重合。一是现代作家。川大在其百余年历史中涌现出诸多的文学名家乃至大师，他们在校读书育人的经历，不但是其个人宝贵的生活财富，更是现代文学史鲜活的历史内容。二是现代文学学科。现代文学既是一段当下仍在继续的历史，同时又是建国后高校中文学科里重要的专业设置。梳理川大现代文学学科在创立后半个多世纪里做出的卓越学术贡献，同样是研究四川大学与中国现代文学关系的一项关键内容。

上篇 四川大学与现代作家

四川大学与现代作家间深厚的历史因缘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其特殊的发展历程。在川大悠久的历史中容纳着诸多院校的兴废分合。解放前的四川国立大学是在 1931 年由国立成都大学、国立成都师范大学与公立四川大学三校合并而成，其中成都大学与成都师大在历史渊源上可追及 1704 年创办的锦江书院和 1875 年兴建的尊经书院，但其作为现代教育机构肇始于 1896 年成立的四川中西学堂，其间又涉及两校前身四川高等学校与四川高等师范学校繁复的分合历史^②。公立四川大学则是在 1927 年由五所专门学校联合创建^③。考虑到川大在正式组建前后不同的存在形态，1931 年将是我们叙述新中国成立前川大作家的一个分界点。

—

在 1931 年以前川大各前身的分合变迁中，作家主要集中在两所学校。一是

^① 本文“现代文学”是一广义概念，意在同时指称在当前学术体制中被分为三部分的近代文学、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

^② 四川高等学校与四川高等师范学校均为 1912 年民国教育体制改革而设，前者的前身是 1902 年由四川中西学堂、锦江书院、尊经书院合并而成的四川省城高等学校，后者则是沿自 1905 年创建的四川通省师范学堂，两校 1916 年合并为国立成都高等师范学校，1926 年至 1927 年间又分别独立为国立成都大学与国立成都师范大学。

^③ 五校为四川公立法政专门学校、四川公立外国语专门学校、四川公立农业专门学校、四川公立工业专门学校、四川公立国学专门学校。

作为四川省城高等学校下属机构的附属中学堂，学校在辛亥革命前教育质量远胜其他中学，属于那个时代的地方“重点”，其学生中不乏四川现代历史上的杰出人物，郭沫若与李劫人即为此校同窗。一是1926年改组的国立成都大学，其首任校长张澜（掌校时间1926至1930年）坚持“兼容并包”的办学理想，广聘是时川人眼中的“新派”学者如李劫人、吴虞、吴芳吉等到校任课，无形中加深了川大在1931年前与现代作家间的历史联系。此外，在此时段公立外国语专门学校与成都高等师范学校的师生名单中，我们还能分别找到李尧堂（巴金）与叶伯和的名字。

在这些人中，最早与川大发生联系的是吴虞。1892年，吴虞入尊经书院师从吴之英、廖季平等名家学习，打下了坚实的国学基础。戊戌变法后又对新学发生浓厚兴趣，大量阅读相关读物，眼界大开，时人谓其“不顾鄙笑，搜访弃藏，情稽深览，十年如一日”，为“成都言新学之最先者也”^①。1907年，吴虞自日本留学归国，任四川法政学堂官班教习。1910年，他因著文揭露其父丑行，被当时四川学界的保守人士视为忤逆尊长的“名教罪人”而赶出教育界，次年又因著文反对儒家家族政治遭四川护理总督通缉，被迫逃离成都。尝自叹“外遭社会之陷害，内被尊长之毒螫”。直到辛亥革命后的1918年，他才重新回到原来任教的四川公立法政专门学堂执教，稍后，同时被四川公立外国语专门学校、四川公立国学专门学校聘为教员。1921年秋，吴虞应蔡元培邀请到北大、北师大讲学，在1925年返川后，先后执教国立成都大学、公立四川大学。1931年三大校合并，吴虞被聘为国立四川大学文学院教授直至1933年退休。

吴虞在成都各专门学校任教时，恰值“五四”新文化运动蓬勃发展的时期，地处西南内陆、长年闭塞的四川也泛起了几波新潮的涟漪。1919年，四川新文化刊物《星期日》创刊，吴虞积极参与了刊物创办的筹备工作，并一直是此杂志的名誉编辑与主要撰稿人，在其上发表有《说图书馆》、《成都的女学》、《太极图新说》等文章，皆是针砭旧俗、鼓荡新风之作，其中1919年在《星期日》上首发的《吃人与礼教》一文，更是被《新青年》六卷六号转载，并与鲁迅的《狂人日记》一起在其时社会青年间引起极大反响，“吃人的礼教”成为当年新文化向旧道德进攻时一个重要的战斗口号。此外，他还亲自指导成都外国语学校学生编辑新刊物《威克烈》，其1919年11月24日的日记记录了他召集学生开会办刊的情况：“举周报经理员、编辑员、印刷校勘员、发行员、主笔员，议定周报名曰《威克烈》，即周刊之义也。”^② 尽管在“五四”以后，吴虞似乎逐渐落后于文化潮流的发展，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停止了对尊孔复辟的批判，直到1928年，他还发表文章《关于祀孔之我见》，抨击成都旧派文人“摇唇鼓舌喧喧于牛市口上”的丑态。1932年6月，时任四川大学教授的吴虞出版了他的《吴虞文续录别集》（成都美信印书局出版），其中收入的新作中仍有《驳康有为君臣之伦不可废说》

^① 廖季平《骈文读书序》，《蜀报》第一年二期（1910年9月）。

^② 吴虞《吴虞日记》（上），中国革命博物馆整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99页。

等驳旧名篇。

继吴虞之后，1931年前有过川大求学经历的现代作家还有叶伯和、李劫人、郭沫若、巴金四人。

1904年，年仅15岁的叶伯和进入四川省城高等学堂学习，直至1908年随父兄东渡日本。1914年，成都高等师范学校响应教育部长蔡元培“美育代宗教”的主张，开办乐歌体育专修科。回国两年的叶伯和遂被聘为该校第一位音乐专科教授，一直到1924年因身体原因辞职。

在教学初期，为了方便音乐教育的开展，叶伯和专门为学生创作了一些“乐歌”：“我在高等师范教音乐，坊间的唱歌集都不能用……若是用典故结晶体的诗来教，小孩子怎么懂呢？我自己便作了些白描的歌，拿来试一试，居然也受了大家的欢迎。”^①这些“白描的歌”中很多其实就是早期的白话新诗，其中部分作品被收入了叶伯和1920年出版的《诗歌集》一书（上海华东印刷所出版），是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继胡适《尝试集》后第二个出版的新诗集子。除诗歌外，叶伯和在“五四”时期还创作了一些散文和小说，分别刊载于同时期的《星期日》、《直觉》、《人声》等成都新文化刊物上。

“五四”时期，全国新文学社团竞相出现。1922年，叶伯和在成都组织了四川第一个新文学社团“草堂文学研究会”，出版期刊《草堂》。刊物前后只出了四期^②，但在当时中国新文学界里还是有一定影响的，茅盾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导论》中专门提到过这个杂志，郭沫若、周作人也曾先后撰文表示对《草堂》的支持。此外，《草堂》还同全国各地的新文学社团刊物如创造社、浅草社、广东《南风》等建立了广泛的联系，为新文化在四川与其他地区间的传播交往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1908年，李家祥（劫人）考入四川省城高等学堂附属中学堂丁班，第二年升入丙班。与同学郭沫若在《反正前后》中对这所学校颇多怨懑不同，李家祥在保守的教育氛围中更多感受到的是几位教员人格上的正直。其中如学校监督刘士志、英文教员杨沧白、国文教师刘豫波都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个人对中学时代的先生，所受影响最大，塑性最强的，有两位。一位是达县刘士志（讳行道）先生，教我以正义，以勇进，以无畏之宏毅……另一位便是双流刘豫波（讳成荣）先生，教我以淡泊，以宁静，以爱人。”^③此外，学校学生在生活待遇上的优厚，以及在刘士志监学时学风的优良，也使他对这所学校留下了良好的印象。可惜刘士志在李家祥入学的第三年离川北上，其后接任的都永和（即郭沫若《反正前后》中的“都喇嘛”）无心学务，只知欺下媚上，分设中学在其手中学风日下并最终解散。多年后忆及此事，李劫人仍是愤慨不已。

李家祥在校期间正是四川保路运动风起云涌之时，他以学生代表的身份参加了保路同志会1911年6月的成立大会，又与郭开贞（沫若）等同学一起亲眼目

^① 叶伯和《诗歌集·自序》，转引李临雅《叶伯和先生其人其事》，《晚霞》2007年第9期。

^② 出刊日期分别为：1922年11月30日，1923年1月20日、5月5日、11月15日。

^③ 李劫人《敬怀刘豫波先生》，《李劫人选集》第五卷，四川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85页。